

绪 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通过各种文字符号表述而流传至今的文献，就是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

一、文献和文献学概念

“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杞不足征也；宋礼吾能言，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段话大意谓孔子说：“我能说夏代之礼，可惜杞国（周封夏后裔之国）未能为我说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能说殷代之礼，可惜宋国（周封商后裔之国）未能为我说提供足够的证据。这是因为杞、宋二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的缘故。假如有了足够的典籍和贤人，我准能引来证成我说了。”可见，“文献”一词的最早含义：“文”指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献指活着的贤人贮存在他们脑中的文化学识、典章制度等记忆和他们的口传议论。“文”是“献”之体，“献”是“文”之主；“文”是“死资料”，归根结蒂，还是由

“献”这个“活资料”综合“死资料”创造出来的“文”。二者交相为用，遂成“文献”。

用“文献”一词作为书名的有金代耶律履《文献公集》、元代中后期黄潜《文献集》。但两人因谥号为“文献”，故后人将其编别集是以谥名书而已，并非研究文献之书。真正研究文献并以此名书的是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于书前自序云：

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议、诸儒之议论谓之献。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有的学者引马氏这段话之后得出结论说：“这里的‘献’……它的涵义已经和‘文’接近了，‘文’和‘献’的差别缩小了。”（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意思是孔子所谓“献”是指杞、宋二国活着的贤才口头讲述议论，而马氏所谓“献”已都变成了文字资料而非口传议论。似乎马氏之“文”与“献”与孔子所说比较，二者的涵义“差别缩小”了。但这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实质是口头议论与书面材料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第一、孔子的春秋时代杞、宋两国的贤人如果很多，便能用他们口头议论证成孔子夏礼、殷礼之说。那么他们口头议论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还不是和孔子一样，读典籍（文）读得多，有关夏商之礼的代代口传听闻较广么？第二、如果他们的远祖在夏商之世把关于礼制的史事和看法当时就用文字写出来，则与马端临所说的“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有何本质区别？他们也可能当时就写过，只是到春秋时已亡佚了。第三、或者他们当时并未写下来，仅存于脑中而代代口传于子孙后世。如果

孔子去征引这些子孙的见闻，他们既可口述，也可写成书面资料，则又与马氏所谓‘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议以至名流之燕谈’有何本质区别？可见“文献”一词之涵义，马氏之阐述仍是遵循孔子原意精神而来。只是孔子所说‘文献’仅限于‘礼制’一项，而马氏《文献通考》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采、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四考，囊括了整个社会各种制度的历史沿革状况。加上至宋元时，典籍之多远非孔子时代可比，他岂能每项内容都去征引‘贤人’口述？何况‘近代诸儒之评议以至名流之燕谈’，本身就包含了宋末时贤的看法在内。

明清时期，常把‘文献’指代书籍资料。如明初编《永乐大典》，原名叫《文献大成》。焦竑有《中原文献》、程敏政有《新安文献志》；清代有钱林辑、王藻编的《文献征存录》等。也有只用‘献’字代指贤人传记资料的，如明焦竑编《国朝献征录》、清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等。

近现代用‘文献’一词的含义，除了保留传统的从《论语·八佾》到《文献通考》那两种含义外，还有两种新义：一是指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图书档案资料，如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了36辑，另有增刊6辑的《文献丛编》，主要就是发表清代至辛亥革命一批内政、外交等档案资料。二是指具有某种学术价值的专著、论文等。例如《科技文献管理》（周六炎）、《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等。这两种新义，显然是对‘文献’古义的引申。

但是，也有把‘文献’的定义界定太宽的。如《辞海》解释‘文献’一词古义之后云：“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

《辞源》亦云：“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两个定义都包含‘文物’，实则有些文物虽有历史价值，却并不属于文献。例如很多原始社会人类遗址中出土的古代猿人骨骼，以及出土的古代石器、金属制造的各种生产工具、兵器，某些陶制、玉制等生活器皿等，上面

既无文字，也无图画或其它任何信息符号。这些文物虽然具有历史考古意义，但却不算文献。文献必须具有传递信息的符号，如古代文献是靠文字、图画或表意的刻符等附载于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等固态物质载体上来传递信息的；现代文献除依靠文字、图画、表格、数字、公式等附载于纸张或胶片上之外，新式的文献也得依靠音响、影像、声像等符号附载于录音磁带、感光胶片等载体之上。因此，不具备传递信息符号的文物就不能算“文献”。

另一种观点则把文献等同于古籍，如郑鹤声、郑鹤春 1928 年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全书七章，均是论述书籍的导言、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对非书籍古代文献如甲骨文、钟鼎等金文之类，均未涉及。当代出版的某些文献学专著，也把古籍等同于“文献”。虽然古籍确实是古代文献的主要部分，但决非全部。因为还有甲骨、青铜、石碑等有文字的文献载体，都不算古籍（将这些拓印成书才能转化为古籍）；那些未经整理编纂的出土零星竹简和档案材料、信札、契约等，属于古代文献，但仍不能算古籍。古籍必须是成书的簿册（如竹简木牍编成的简策、册、缣帛书写的一卷或一部书、纸写本、印刷本书籍等）。

“文献学”是现当代兴起的一门学科。虽然 20 世纪以来已出版了好几种文献学专著，但对于“文献学”的概念仍未形成一种相对一致的认同。多数命名“文献学”的专著，如上所述，主要是讲述古籍的专著，而在古籍范围内又以讲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主，或加上阅读、检索古籍的常识。这当然的确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作为文献学学科专业的用书，理应兼包古今中外文献内容，除了文献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传统内容之外，还应包括文献的载体演变、记录方式、装帧形态、文献积聚、散失、整理、兴衰的历史、文献内容从传统到当代分类的变化、文献编纂体裁的分类、文献的检索方法、保藏方法、流通方式等等。

作为非文献学专业的文献学用书，则应根据各种读者实际需要的不同而在编写内容上各有侧重。例如《中国古典文献学》书名就限制在“中国古典”如果不涉及古代非书文献，那书名就应当是《中国古籍文献学》。如果只涉及古代文、史、哲、农、医等某一个学科的文献学，那就叫《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或《中国古典历史文献学》等等。这样才名实相符。现在有的文献学专著就存在着名不符实的现象。

其次，文献学应当注重实用和鼓励创新，注重实用就应力避空疏和突出重点，鼓励创新就应避免面面俱到，力求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编著出各具特色的文献著作或教材。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等博士、硕士专业及本科课程，以及社会上相关的研究所如文献所、出版社、图书馆、高校古籍研究所等单位从事“三古”的专业人员，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掌握相应的文献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尤其需要了解本专业和相邻专业从古到今有关文献的详细状况。然而现已出版的文献学，绝大多数并未为他们提供这种系统的详细状况。唯潘树广编著的《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还比较重视这种实用意义，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本科文献学教材，比较切合实用，但如用作“三古”专业的研究生该课程教材，以及供从事“三古”专业的在职专业人员参考，则仍嫌不足。特别是当前高校教改提倡“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正在逐步实施大文科，如文、史、哲相互渗透，甚至文理工相互渗透，对于“三古”专业的研究生而言，文献学就应重点为他们提供文、史、哲等文科古籍文献及其研究状况。因为一则古代文史哲本不分家，很多文学家也兼治史、治子，现在要“宽口径”，培养通才，更应打破学科专业过细的壁垒；二则古典文献学若只讲经、史、子、集四部及其各部子目，各举数例，并未包括古代研究这些部类的文献状况，而要指导他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无法落实。例如经、史、子、集四部书中，通代、断代都有一批重要名著，这些名著的编

纂体例 内容梗概 优劣得失 以及后代迄于当代对这些名著有哪些重要的注释、考证及研究的文献等等，文献学应该有系统地梳理、提要的任务。只有这样，文献学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读书治学的指导门径，科学研究的航标路灯。总之，文献学应突出实际致用，把指导人们懂得如何有效地高度、充分利用文献为治学科研服务，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文献学的价值才能充分发挥而为人们所重视。

二、古籍文献存亡概况

中国古籍文献是在不断地积与毁、亡与存的反复交替过程中兴衰更迭地发展至今的。由于历代各种战争（如军阀混战、农民起义、外敌入侵等），兵祸频仍，统治者出于思想文化禁锢的焚书销毁以及自然灾害如水、火、虫灾等 的发生 造成了古籍大量的损失亡佚。《隋书·牛弘传》载 隋文帝开皇初 秘书监牛弘上书建言 广开献书之路时 曾列举书遭“五厄”：一是秦始皇“下焚书之令”使“坟籍扫地皆尽”；二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三是东汉末年 董卓“西京大乱，一时燔荡”；四是西晋末年“刘（渊）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阙典，从而失坠”（按 包括八王之乱）；五是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书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及周师入郢（萧绎悉焚之于外城）。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 596 家，书 13 269 卷，至梁代阮孝绪《七录序》记载 已有 552 家亡佚，只存 44 家。据当代学者估计，《汉志》著录的书籍 现存书已不满 2 000 卷。梁元帝萧绎据江陵，因北周攻陷，萧绎不欲图书为北周所得，7 万卷书便随之焚毁。

明朝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中又补论了牛弘“五厄”

为“十厄”六是隋末杨广曾下令搜焚天下纬书，七是唐代安史之乱两京图籍毁于兵燹，八是唐末黄巢攻陷长安、洛阳，“宫庙寺署，焚荡殆尽”，原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一时散失”（《旧唐书·经籍志》），九是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毁于金国陷汴京的“靖康之灾”，十是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再盛于嘉定，而终毁于蒙古骑兵“绍定之祸”。

胡应麟补论“十厄”只讲到宋末，实际上元末、明末农民起义，都曾攻陷北京。如明末内阁秘府所藏典籍，“至李自成入城，付之一炬”（《韵石斋笔谈》卷上），吴梅村家藏大量金元图书，在明末清初动乱中也毁于一旦，他为此曾作诗痛愤，见《梅村家藏稿》卷十九，特别是清代大兴文字狱，据统计，共下令焚毁书籍达24次之多，共焚毁书13862部，其中销毁将近3000种，六七万部以上。（据孙殿起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序》），晚清太平军入扬州、镇江、南京、宁波等地，焚毁大量典籍，著名的天一阁藏书在战火中损失大半，尤其儒家经典，太平军所到之处，“不投之于溷厕，则置之于水火”（《纪闻类编》卷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永乐大典》等典籍被焚抢而光。至现当代，如中日战争，日军“三光”扫荡，古籍损失惨重，仅上海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便有50多万册图书几乎荡然无存；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浩劫中，公私古籍被抄被焚者更不计其数。

除上述社会原因之外，还有自然灾害，如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高祖李渊命司农少卿宋遵贵将东都洛阳收取的隋代古籍用船载往长安，但运至黄河砥柱时，多被大水漂没，“所存者十不一二”（《隋书·经籍志序》），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三馆秘阁失火，36280卷藏书全被焚毁（程俱《麟台故事》卷二），明英宗十四年（公元1499年），南京文渊阁失火，藏书“悉为灰烬”。明编《永乐大典》未刊，只有抄本两部，其副本毁于八国联军入北京，正本则早于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毁于清宫失火。至于私

家藏书，毁于水、火、虫灾者，不胜枚举。

以上所述，凡由社会动乱引起每一次古籍毁灭之后，新王朝总得又重新积聚清理一次图书。例如秦火焚书之后，汉兴，至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下诏：“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文选》卷 38 任访《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再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主持校书。至哀帝时刘向卒，诏令其子刘歆卒成父业。经过 20 年，向、歆父子撰成《别录》、《七略》共有图书 33 090 卷，据《隋书·经籍志》）

王莽篡汉建新，赤眉军起义攻入长安，西汉 200 年积聚的古籍、文物几乎焚毁殆尽。及“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建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数，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仁寿阁积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校焉。”（《隋书·经籍志》）。班固正是在此基础上后来撰成《汉书·艺文志》得《七略》所载书尚存者只剩 13 269 卷了，至汉末献帝时，董卓作乱，长安洛阳为兵火化为废墟，图书自然荡然无存。

经过魏、晋两代逐渐重新积聚，加上又得战国魏墓汲冢一批简策，荀勖所著《中经新簿》目录合四部书共 29 945 卷（《中经新簿》已佚，此数字据《隋书·经籍志》）。晋武帝死后不久就爆发八王之乱，后被匈奴刘曜（刘渊子）氏人石勒先后攻陷洛阳、长安，所谓“怀惠之乱，京华荡覆，渠阁秘籍，靡有子遗。”（《隋书·经籍志》）就是指西晋灭亡，古籍亦亡。故东晋南渡之初，虽又重新积聚图书，但据当时著作郎李充整理藏书，只剩 3 014 卷了。

南朝宋元嘉八年（公元 431 年）秘书监谢灵运奉命编纂国家藏书，撰成《四部目录》共有 64 582 卷。其后战乱有减有增，齐永明年间秘书丞王亮、谢朓编《四部书目》仅 18 010 卷。梁秘书监任昉清理文德殿藏书共 23 106 卷，至梁元帝时，将文德殿藏书并入

江陵 共达 7 万卷,后因北周入侵尽毁于自焚。

隋代北周之初,牛弘上书说只有 15 000 余卷 及灭南朝陈,“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但至隋末时 据《隋书·经籍志》载 已达到 14 466 部 共 89 666 卷。但如前所述,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得隋朝洛阳图书 命宋遵贵载往长安途中时 多被大水漂没,存者十不一二。故唐初继承隋朝书籍实际很少。修《隋志》是按隋朝存目得来的数字。

唐代很重视聚积文化典籍,加上唐朝新的著作也多。故开元时毋斐所编《古今书录》共收书 3 060 部 51 852 卷。《新唐书·艺文志》即据开元书目整理补充 共录四部书 3 277 部 52 094 卷 再加唐人新撰著述 27 127 卷 佛经、道藏 9 500 卷 三项合计已有 88 721 卷。结果毁于唐末战乱。

宋代重文治,印刷术发达,文献遽增。仁宗庆历元年(公元 1041 年)编成的《崇文总目》仅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就已积聚了 30 069 卷。至徽宗政和七年(公元 1117 年)孙覿、倪涛、汪藻、刘彦适等编《秘书总目》已共藏书 6 705 部 73 877 卷。靖康之变 毁于金兵战火。南宋经高宗、孝宗两朝积聚,至淳熙五年(公元 1178 年)秘书监陈騭上《中兴馆阁书目》共有书 44 486 卷。宁宗嘉定十年(公元 1217 年)秘书丞张攀续编馆阁书 又新增 14 943 卷。至元朝修《宋史·艺文志》加上宁宗以后的积聚 共 9 819 部 119 972 卷。

元明清三代,因史志只载本朝人著录,不录馆阁所藏前代书籍 故难以统计。不过 仅《永东大典》就收书七八千种,22 000 多卷而《四库全书》就收书 3 461 部 79 309 卷 外加存目 6 793 部,93 551 卷 仅此两项相加 便有 10 254 部 172 860 卷。若再加上禁毁书籍 13 862 部 则有 24 116 部 约在 30 多万卷上以上 可谓空前丰富了。

现存古籍文献 据民国时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认为不下

40 万卷。而当代学者估计，我国现存古籍文献当在 8 万种以上（见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15 页 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三、本书编著体例说明

先说本书编撰的缘起。编者多年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本科教学及该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工作中，特别是多年为硕士生开“古籍文献学”课程中，一方面深感中国古籍之浩如烟海，常令人不得要领而望洋兴叹；另一方面也深感年轻一代对于古籍文献的了解，简直是惊人的陌生和肤浅！即使开了文献学课，他们绝大多数“查资料”仍习惯于只看今人的论文和专著，东摘西抄，仍是第二手资料；而不去充分利用古籍第一手资料。究其原因：一是阅读古籍的能力较差，即使对有旧注的古籍阅读理解尚很困难，更遑论对众多无注的白文！故其心中有一种对古籍文献的潜在畏惧心理。二是文献学实践性很强，即使开过此课，学了文献学的一般原理之后，还得要靠大量在书库中的翻阅实践，才能将理论消化，并转变为有效利用文献资料去指导治学科研的能力。而教师授该课时，受课时限制，虽然也用 1/4 到 1/3 课时到图书馆现身说法，指导他们动手检索，但那毕竟只是各类古籍举例性的实践而已，对于林林总总的古籍不啻九牛一毛。其三便是现有的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专书，虽然出版不少，也都各有特色，但却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分类条理清晰的要籍提要及各类各书的系统完整的研究书目系统。虽然有《四库全书总目》、《简明四库全书目录》、《书目问答》等可资利用，但一则观点陈旧，版本著录不仅少述源流，且近现代已有很多经过精心校注的整理本也未反映出来，恰恰这种整理本更适于年轻一代阅读。

至于对某类书后人的研究书目，特别是现当代人研究著作，不

仅《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之类无法提供 即使当代出版的目录学、文献学专著 也均无较系统的反映。例如古代文学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和北京师院中文系资料室曾编印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00—1979) 但只收论文而不收专书 而且只到 1979 年为止 后有续编 亦只到 1984 年为止；而研究的专著系统书目，迄未曾见。史学方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编印过《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 不但只到 1975 年 而且收录亦缺漏太多。《民国时期总书目》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卷 对本阶段出版书目虽收罗较全 但因有书必录 未加别择 部帙浩繁 作图书馆备查资料可以，作为本科、研究生专业文献研究书目就不适用。此外《全国新书目》(月刊)《全国总书目》(年刊)是综合性连续出版物 部头更大 要想查阅几十年某一专业的研究书目 不知要翻阅多少麻袋的卷帙才能完成！何况它们也只限于建国以后几十年。

鉴于此 笔者数年前就着手分类编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目”采取要籍提要 后附该书古今重要研究书目 其余未提要的则只列该类书 如文学史、文论史及各体文学、各类题材文学的通代论著等 酌古今研究书目 后来为了“宽口径”又着手编史学、哲学要籍提要及研究书目。以《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以后续编书目、《书目问答》、《民国时期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以及现当代人编的各种专门书目、专书书目和一些杂志上介绍的港台某阶段的专科学目等为参考 博收严择 历经数年 不断增补 渐成初稿。在此基础上 又根据“三古”专业的实际需要 广采诸家之说 择善而参以拙见 撰成文献学理论部分六章。本拟合两部稿为一书出版 以利实用、方便 但一则部头太大 翻检不便；二则书名也很难做到简短而又尽赅；三则“要籍提要及研究书目”部分仅成初稿。修改誊正才完成一半，全部完成尚待时日。考虑再三 仍分两书出版为宜 先将已完稿的理论部分定名为《中国古

典文献学》付梓 至于《文史哲要籍提要及研究书目》待改誊完稿后作配套的姊妹编出版。

《中国古典文献学》之所以冠以“古典”二字,一是因为该书仅限于对古代文献的论述;二是它不包括现代新起的依靠音响、影像等符号附载于磁带、胶片、光盘、网络等载体之上的文献。全书除“绪论”之外,分为六章。大抵囊括了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其中一、二两章从总体上概括论述了文献和古籍文献的外部、内部的结构特征。为了“古为今用”兼顾古今文献分类的实际而又能避免重复交叉,故第二章特从编纂体裁和体例上对古籍文献进行分类论述。第三章“古籍文献的目录”则是从古籍内容按历史传统分经、史、子、集四部来分类论述。这样既避免了《四库全书》分类中体、义标准混淆的弊病,又有利于把由古、今分类差异而形成的复杂问题说得更加透彻明晰。三至六章分别为古籍文献学所包含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也是传统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虽各自只设一章,而力求将三种各自可单独成为专门学问的有关内容言简意赅地尽量包容殆尽,并分别勾画出其历史源流演变的线索,注重理论与实践、概论与史略、系统与重点、观点与例证这四个方面的辩证统一。至于古籍文献的辨伪与辑佚等内容,则拆散融入各章之中兼带叙论,不另立专章,以免繁冗。此外,第一章中“古籍装帧的体式”与第四章“古籍文献版本学”也各有侧重,详略互见,而避免重复。

为了增强广大读者学以致用能力,特别是古籍整理的能力,本书特地增加了“古籍文献注释学”一章。这是已经出版的各种文献学中所没有的。注释学本是一门单独的学问。其历史几乎与古籍中儒家经学史一样长久。从孔子为《周易》作《易传》(十翼)及传为其弟子子夏、卜商所作的《周易卜商传》、为《诗》作传、为《礼》作《丧服传》、及传授《春秋》的《公羊》、《谷梁》二传起,便是经学的早期注释。至东汉以注释名家者 20 余家,其中如王逸《楚辞章句》、许

慎《说文解字》、赵岐《孟子章句》、郑玄注《毛诗》、《三礼》、《周易》、《论语》、《尚书》、何休《春秋公羊解诂》、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应劭《风俗通义》等对后代影响都很大。魏晋南北朝期间曹操《孙子略解》、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老子注》、孙炎《尔雅音义》、杜预注《左传》、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葛洪《本草注》、裴松之《三国志注》、酈道元《水经注》、祖冲之《九章算术注》以及南北高僧的各种佛经注，已从先秦两汉主要注经扩大到注释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唐代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子勋、李隆基（玄宗）、元行冲、宋代邢昺、孙奭等进一步完成了《十三经》的注疏。此外唐代李善注《文选》、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等注《后汉书》、尹知章《管子注》、杨倞《荀子注》、王弼注《黄帝素问》、道世《金刚经集注》等都影响很大，注释学已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宋代注经一反汉唐章句训诂传统而重在疑古翻新探求义理，如欧阳修《毛诗本义》、王安石《三经新义》、苏轼父子《易传》、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等，同时扩大到对诗文别集和金石书画的注释，如方崧卿《韩文举正》、《外集举正》、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文集》、韩醇、童宗说、张敦颐、潘纬等注释柳宗元集合为《增广注释音辨柳集》、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徐居仁、黄鹤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等。金石书画的考注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米芾《画史》、《书史》等都很有价值。历元明至清，注释更加兴盛，清代集注释之大成，注解经学的著作就有390部。据阮元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编《续皇清经解》，又如对别集的注释出现了钱谦益《钱注杜诗》、杨伦《杜诗镜诠》、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王琦《李太白诗集注》、《李长吉歌诗汇解》、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冯诰《玉溪生集笺注》、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权威注释，此外子、史方面的考注也不少。

由此可见 注释古籍对帮助读者阅读古籍、弘扬传统文化、研究文史哲等学术，从而更好地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了。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哲及自然科学古籍中，已为古人注释过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大量的古籍不但从未有人注释 连校勘、整理均尚未进行 历史的重任当仁不让地落到当代治“三古”专业的年轻学子和专业工作者肩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 各省市社科院、高校及图书馆也都分别承担了古籍整理的任务。有些古籍不仅需要点校、汇编 还须注释甚至翻译 才能有利于全社会的普及和提高，进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注释学就包括标点断句、注释、翻译等内容 但它又必须以目录学为指南、版本学为前提、校勘学为基础 然后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以及文学史、文化史等知识和检索使用经史子集、字书辞书、丛书类书、政书地志等群书的能力 才能胜任。因此 本书将它置于最后一章 就意味着它是对前几章文献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综合运用与实践检验。这也是本书章节构架的一点深意所在。

第一章 文献载体的形态

文献载体，指附载文献内容的人工固态物质材料，它具有传递和贮存文献信息的功能。但文献的构成，除载体之外，还应包括记录文献于载体之上的方式和文献装帧的体式。

第一节 文献载体的种类

我国古代文献的载体 先是甲骨、青铜器、玉版、石碑 继用简牍、缣帛 最终是纸。当代科技发展 又出现了胶片、磁带、激光盘等新式文献载体。甲骨、青铜器、石碑 属文献载体 但不属于古籍文献 图书 载体 古籍文献指的是古代图书 其载体包括简牍、缣帛、纸三类 玉版虽有出土实物 但已不存文字 但后三类是从前三类发展而来的，故一并分述之：

（一）甲骨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载体是商朝记载占卜吉凶卜辞的龟甲兽骨。这种记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是当时史官保存的重要文献。因为是从殷商废墟出土发现的 故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 但在历史上曾长期湮埋无闻 直到晚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年）才被北京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

然发现 遂四处搜求 共积有 1 500 片。王死后，这些甲骨为丹徒人刘鹗(《老残游记》作者)所得 他又继续多方搜集 增至 5 000 片 遂择其字迹完好者编成《铁云藏龟》于 1903 年拓印问世 此即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次年，孙诒让据此撰成《契文举例》二卷，即开甲骨文字研究之始。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进一步广泛搜访 罗先后搜得 30 000 片 编印成《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续编》等 王国维编有《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并著有多种考证论著，取得了甲骨文与商史研究的硕果。从 1928 年至 1937 年，国民中央研究院先后在河南殷墟进行了 15 次考古发掘，将发掘出的甲骨文编成《殷墟文字甲编》、《乙编》。此间 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陈梦家、商承祚、唐兰、张政烺、严一萍等人均对甲骨文的考释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清末民初 英、美、法、德、日等东西列强曾从我国大量运走甲骨。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止 国内大陆有 40 个城市 90 多个单位收藏甲骨共 10 万余片；港台藏有约 3 万片；日本、加拿大、英、美、德、俄、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 10 国共藏有 26 000 多片(据胡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甲骨每片少则几个字或几十字 多则达 180 字。现存甲骨单字共约 4 500 字 但可识解者不过 1 000 字而已。从发现甲骨至今 90 多年间，国内共收藏甲骨拓本 190 多种 共 15 万片左右。著录甲骨文的专书有 70 多种 论文 40 多篇 共著录甲骨约 69 000 片。考释研究之著述更多，1950 年以前半个世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近 300 人 论著约 900 种；1950 年至今 40 多年 国内研究者约 100 人左右 论著约 400 种 加上国外发表的论著，据一位外国学者估计当在 1 000 种左右。

1955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了《殷墟文字缀合》 将断碎的甲骨联接缀合成文。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1965 年考古研究所又编印了《甲骨文编》 收录了 4 672 字 可释者近 1 000 字，每字注明出处和简释。于省吾的《甲骨文

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等，都是研究甲骨文的重要专著。至 20 世纪 70 年代，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则是一部巨大的甲骨文资料总汇。经过认真的去伪、去重、缀合，选出甲骨 41 956 片，先按时代先后分为武丁及其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五个时期，各期再按内容分为：(1) 阶级和国家（包括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七个小类）；(2) 社会生产（包括农业、渔猎畜牧、手工业、商业交通四个小类）；(3) 思想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八个小类）；(4) 其它，共 4 大类 20 个小类。以上图版部分分为 13 册，已由中华书局 1978—1983 年出齐。另有释文、索引、附录等册。该书未收录的小屯发掘的甲骨，则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整理，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收录甲骨 4 612 片。

1977 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发现周代甲骨 17 000 余片，初步清理有字甲骨约 300 片，单字约 600 多个，是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王宇信有《西周甲骨探论》，对此研究作了综述。

（二）青铜

从河南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商代冶炼青铜器的遗址，说明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在殷商时期已大量应用；至于传说中的禹铸九鼎，距今已有 4 000 多年历史，只是尚待出土文物证明。传世的商代青铜器上，常铸刻着类似甲骨文的铭文，一般称为“金文”，以其铭于钟、鼎居多，故又称为“钟鼎文”，恰与《墨子·鲁问》“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相印证。例如商朝的乙酉父丁彝、己酉戌命彝、兄癸卣、戊辰彝、觶尊、庚申父辛觥、般猷等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类似甲骨文的，字数较少，重量最重的是司母戊大鼎，达 875 公斤，在世界青铜器史上也是罕见的。到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较